

中日友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纪念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会晤 50 周年

【摘要】

1974 年 12 月 5 日，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会见，谱写了中日友好的历史佳话。池田大作一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是一名坚定的和平倡导者。他秉持民间外交思想的理念，与中国领导人对话、与中国学者对谈，建构起中日友好话语体系，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中日友好和平事业，不断扩展中日友好话语体系的内涵。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话语体系主要包含的内容有：中日要友好、世界和平需要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文希望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再次呼唤起两国人民心中的和平愿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中日友好话语体系建构的内涵，中日友好必须顺时代潮流而行。

关键词：中日友好 话语建构 池田大作

什么是话语？《中国百科大辞典》对“话语”的定义是“语义上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或思想的一句以上的话或书面上的成段的文句”。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则认为：“话语”并非常识所理解的“中介”，它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历史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成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

池田大作是享有盛名的世界和平倡导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2024 年是池田大作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50 周

周年纪念。中日友好成为池田大作的坚定信念，既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话语的建构来源于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是一种理论的总结与概括。本文主要从“话语”的角度分析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思想的建构过程。

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进行了亲切而友好会见，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载入了中日和平友好事业的史册。两人能达成会见是以共同的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同时这也与池田大作中日友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话语体系主要包含的内容是：中日要友好、世界和平需要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一、中日友好话语建构的必然之维

（一）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悲惨和残酷

“我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悲惨和残酷，我正是从这种切身体验出发，走向反战和和平道路的。”^{〔1〕}池田大作出生于1928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经历了漫长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这场战争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灾难，四个哥哥被迫充军，长兄命丧缅甸。其中，出征后返回过一次的大哥喜一曾经对他说过：“日本军队太残忍了，那些中国人简直太可怜了！”因此他“从心底憎恨战争”，认为日本“再也不能重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战争的残酷和日本战败后的现实促使池田大作改变的还有就是对宗教的认识。池田大作说：“我本来是不认同宗教的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是一个神道的国家。”“从小学时代开始，所受的教育

就是必须努力信仰这个国家的神教。也就是国家在神道的驱使下，日本才走上了战争之路，我们都被出卖了。这使全体国民惨遭不幸”。

[2] 对战争和宗教认识的改变，促使了池田大作发生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

（二）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恩师

“中国的确是日本文化和佛教的源头，是大恩人。我们日本人必须在心灵深处重新认识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并且要不断地付诸行动，为报答恩情的有诚意的行动”。[3] 池田大作认为，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化除了在政治制度、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对日本有较大的影响之外，中国的医学、药理学、农业技术，也对日本有很大的贡献。但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巨大损失。对此，中国政府在战后并没有要求日本的任何赔偿。日本人在梦里都不要忘记这种高尚的心，这种恩义和宽大。

池田大作沉痛地说：“日本战后根本没有向中国人赔罪，一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一直阻挠到最后。对强者阿谀奉承，对其他的人则盛气凌人。这是一个多么没有良心的国家啊！”[4] 这是令人耻于提起的“恩将仇报”的历史，忘恩负义的背叛是耻辱之至。池田大作认为，日本某些人否认侵略历史，不顾中国和亚洲受侵略的国家的民族感情的错误言行，必须彻底改变。日本应该与中国世代友好下去。

（三）周恩来与池田大作对和平价值的认同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然而中日和平局面的开创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建立在周恩来、池田大作等无数有志之士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已有的研究成果用翔实的史料清晰地说明了使中日世代友好，是周恩来、池田大作始终不渝地追求的目标。

20 世纪 60 年代，池田大作带领创价学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会员人数从 150 万户增长到 300 万户，在日本民众中拥有着广泛的基础。

周恩来之所以长期关注创价学会，关键在于创价学会是一个民间团体，是一个一直主张反战、追求和平的团体。周恩来曾经明确地把开展民间的交流和协定的方式称为“国民外交”，周恩来显然是从民间交流这样一种战略思考来对待创价学会的，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关键在于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说，周恩来高度重视创价学会，就是他坚持“中日关系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这一理念的直接表现。

1974 年 12 月 5 日，严冷的北京之夜，周恩来特意对池田大作说：“你正年轻，多多保重，一定有希望见到新世纪。”在当时周恩来看来，决定未来几十年世界发展走向的，正是以池田大作为代表的一批有担当、有远见的青年。后面的事实我们都看到由池田大作领导的创价学会，几十年如一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关注与支持中日友好事业发展的有志青年。

二、中日友好话语建构的主要内容

（一）中日要友好

1968 年 9 月 8 日，池田先生在面对两万名大学生发出“日中

邦交正常化倡言”中大声疾呼“中国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美苏两大阵营的冲突不断，处于冷战时期，同时期亚洲也战争频繁发生，中国问题则自然成为当时解决世界难题的关键。这时池田大作一再呼吁应该恢复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应该具有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公正的国家地位，亚洲及世界的和平需要中国的参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池田大作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问题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触及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第一，要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要广泛地开展经济和文化交流”。

（二）中国问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

池田大作认为 19 世纪是欧洲的世界，20 世纪是美苏的世界，而 21 世纪则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界。池田大作认为，“太平洋时代”来临，而中国和日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两国合作与交流，发挥的历史作用将是巨大的，要实现太平洋时代的和平，通过武力手段显然是行不通的，用暴力维护的和平不是长久的和平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实现太平洋时代和平的道路有很多种，但无论哪种和平道路都应该充分考虑中国的智慧精神，即应当充分发挥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三）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池田大作说，“日中关系降到低点的 1968 年，我反而提出了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观点，也是因为不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广大人民友好相处，任何和平主张和未来展望归根结底都是纸上谈兵”。

[5]

池田大作指出，虽然领导人和人民的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但是，“根据我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中国现在正以 21 世纪为目标从事着变革，并日益取得进步。我坦白地说，为了让中国 10 亿人丰衣足食，中国必定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会放下大国的姿态，全力追求和平。而且中国人深信，他们的下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要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6]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友好话语体系的丰富

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思想具有实践性和时代性。“时代性”是指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思想而是充满活力、与时俱进的。池田大作十分注意顺应时代的变化，这些思想和理念在每年 1 月 26 日“SGI 纪念日”发表的“纪念倡言”中、在访华时的演讲中、以及中国一百多所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授予仪式上的致辞中都有体现。池田大作顺应时代对中日友好思想的精辟论述，成为与时俱进的中日友好的指南。这些指南，如“生命尊严”“和平中道”“环太平洋的实验之海”“中国握有决定 21 世纪文明潮流的钥匙”“人性革命”等等。池田大作深刻指出：“一个人的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久将会实现一国的命运的转变，进而可能转变全人类的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平衡国际格局的重要的力量，中国注重从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实行积极的和平对外政策，不断建立和平友好的双边、多边关系。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双边关系。回顾历史我们既看到钓鱼岛事件后中日的政治对抗与经济贸易摩擦、也看到日

本首相访华与中国签订合作备忘录，开启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程。中日关系总体呈现出对抗与合作起伏不定互相交织的特点。

在全球化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不能走闭门造车的封闭道路，因为产业链将各国的经济紧密地链接到一起。中日两国意识到了在新时代下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必要性。中日双方应当根据国际形势，转变以往的“零和竞争”外交思维，共同致力于发展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新型的双边关系。

美国政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一致认为中国想借“一带一路”向欧亚大陆输出自己的影响力，实现对亚欧大陆的控制权。这一战略这无疑严重地挑战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联合日本、印度等国加入了“印太战略”同盟，旨在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实的情况是日本从 2017 年底主导 11 国签订 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力推行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以期望实现制衡中国与俄罗斯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的目标。

美国从二战之后就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关键因素。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一直作为美国的坚定同盟，与美国保持了良好关系。如：日本于 2015 年通过的“新安保法”，解除了日本自卫队的用兵限制，让自卫队的性质从抵抗外敌演变为具备攻击性的武装力量。这种变化实质是为了更好地配合美国限制中国的战略。

根据 2018 年言论非营利组织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于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率达到 86.3%，而中国人对日本的“正面印象”比率也未达半数。有鉴于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必

须秉承新的理念继续推进两国建立和谐的关系。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共同体”概念而提出的和平倡导。该理念倡导任何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更多地强调人类的共同目标和利益。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共赢、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终极追求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世界各国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通过构建双边对话协商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求同存异，共谋未来发展。

池田大作是一位著名的世界和平使者，为中日和平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和平思想”包含了三个层次内涵：其一，在个人层面上，强调“共生”理念，营造一种人际关系和谐，世界各国利益共存的国际环境氛围；其二，在国家层面上，推行以人为本的友好交流观，重视对话的力量，提倡通过构建各国的对话协商机制来促进世界和平；其三在世界层面上，注重培养世界公民，倡导全球正义与生态保护，主张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7〕

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内涵以及追求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中日友好话语体系当中是丰富中日友好话语体系建构的时代要求。

中国一直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两国存在众多领域的共同利益，加强中日两国交流，对日本主动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持欢迎

态度。而日本在国际形势激烈变化以及贸易争端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理性反思，为重塑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持续做出努力。两国应当加强高层对话与沟通，就双边关系中重大问题进行坦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避免误解和误判，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防止个别事件影响到整体关系。

结语：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池田大作中日友好思想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池田大作中日友好思想的实践告诉我们，相互信赖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相互不信任是中日对抗的深层原因。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 年缔结以来，中日之间有对抗与摩擦，也有合作与共赢。历史证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到达了新的广度和深度的时代，愈是到了今天愈是不能忘记池田大作的杰出贡献。池田大作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掘井人”，中日友好金桥的“架桥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发扬池田大作的中日友好精神，不断丰富中日友好话语体系的内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融入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体系中。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实现政治互信与经济合作、双边关系与区域合作、政府交往与民间交流的良性循环，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与长久和平。

参考文献：

[1] 李锦坤, 刘玉珊, 王贵书: 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2] 木村惠子: 我眼中的池田大作 [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02.

[3] 李锦坤, 刘玉珊, 王贵书: 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第 405 页.

[4] 卞立强编译: 日中恢复邦交秘话 [M].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第 78 页.

[5] [日] 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 [M]. 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12 页.

[6] [日] 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集 [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51 页.

[7] 陈晓春, 何嘉瑜: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日关系——兼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05-28 .